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美)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 著
成伯清 鲍磊 张戎凡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美)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 著
成伯清 鲍磊 张戎凡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美)
威尔逊(Wilson, W. J.)著;成伯清,鲍磊,张戎凡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ISBN 978-7-208-07242-8

I. 真... II. ①威...②成...③鲍...④张... III. 城市社会学—研究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5681号

责任编辑 孔令琴

封面装帧 陈楠

·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

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著

成伯清 鲍磊 张戎凡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212,000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242-8/G·1174

定价 30.00元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编委会

主编

孙逊

编委

薛毅(执行) 刘北成

刘士林 成伯清 陈恒

林鹤 胡大平 倪伟

出版说明

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它与文化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也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期待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生根、发展，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放眼世界，取得新的突破，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去。为达到此目的，大规模地译介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很紧迫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科的自主和创新，必定要建立在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自 2002 年成立后，策划了大型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译丛不仅包括一批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包括显示出最新发展动向的近作，我们注重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名家名著，也注重对某种现象作实证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计划译介一些概论性的著作。总之，只要是对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有参考价值作品，都在我们译介的范围内。我们吁请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吁请更多的翻译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2007 年 3 月

译者前言

1992年12月,当时的美国当选总统克林顿在小石城举办了一次经济峰会,邀请一批顶尖专家共商如何应对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当一位黑人学者站起来准备发言时,克林顿打断了他,说道:“我希望在座的诸位知道,比尔·威尔逊是我们国家在种族问题和城市贫困方面最杰出和最重要的学者。我刚刚读完《真正的穷人》——它只有187页——并且推荐诸位也都读一读”。^①

比尔是威尔逊的昵称,他的全名是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美国社会学家,出生于1935年。在芝加哥大学执教24年之后,威尔逊于1996年转入哈佛大学,现任职于肯尼迪政府学院威纳(Wiener)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是目前哈佛大学17个级别最高的校聘教授之一。

作为一位社会学家,威尔逊所获得的认可和荣誉,恐怕鲜有匹敌者:1988年入选美国文理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990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是该会成立近一个世纪来担任此职的第二位黑人),1991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1996年被《时代》杂志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

^① 这是威尔逊2001年2月14日应邀到美国文理科学院的一次例会上发表演讲时,院长James O. Freedman在主持会议的开场白中提到的一则轶事。参见该院相关网页。

的25人之一,1998年获国家科学勋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这是美国最高的科学荣誉,社会学家极少有人能够问津。此外,他还入选国家教育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美国哲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①与国家医学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等。若再列出40多个授予他荣誉学位的学校名称,就未免太占篇幅了。

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威尔逊卓越的学术成就上。其代表性著作包括:《权力、种族主义与特权》(*Power, Racism, and Privilege*)(1976)、《种族重要性的降低》(*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1979)、《真正的穷人》(*The Truly Disadvantaged*)(1987)^②、《当工作消失时》(*When Work Disappears*)(1996)和《架通种族鸿沟的桥梁》(*The Bridge over the Racial Divide*)(1999)等。作为城市贫困和种族问题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威尔逊还主编了许多相关主题的著作。

威尔逊的著述风格以深入浅出见长,既能满足同行专家的严苛要求,也能为一般公众所接受。众所周知,二战以后,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渐呈学院化、专业化乃至琐碎化的趋势,且在“要么出版要么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下日趋严重。回避主要的社会问题而满足于量化技术的炫耀,已成美国社会学者的一大弊

① 这一学会由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43年发起成立,是美国最古老的知识学会,也是美国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组织。入选者皆精英,但不限于哲学领域。目前成员不足千人。此不同于专业性的美国哲学协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② 此书名亦可译为《真正的弱势群体》、《真正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或《真正处在底层的人》。为求简洁,我们就径直译为《真正的穷人》,以突出书中所强调的不仅仅是经济上贫困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几乎一无所有的状况。

病。正是有鉴于此,美国社会学会在1997年专门设立了“社会学公众理解奖”(Award fo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ociology),以鼓励社会学者直接面对一般公众撰述,以显示这门学科的使命及其对社会和文化进程的独特洞察。1998年,威尔逊即因促进了美国公众对于种族关系和黑人社会经济状况的理解而获得此奖。事实上,威尔逊的不少著作,都属于社会学中的畅销书。甘斯(Herbert Gans)在1997年曾对在世的社会学家所撰写的最畅销著作(排除了教材,因为一般公众并非教材的主要读者)做了一个统计,在销量超过5万册的53本书中,威尔逊的两本著作(即《真正的穷人》和《种族重要性的降低》)名列其中,而且《真正的穷人》可能是榜上有名者中使用数字最多的一本著作。^①

但无论威尔逊在美国如何具有影响力,也无论其著作在美国公共政策的讨论中起到多大作用,这些或许能使我们注意到这本著作,却不是我们翻译此书的主要理由。因为西方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未必跟我们的社会具有相关性,他们所创造和使用的概念和视角,也未必有助于我们分析自己的问题。事实上,处在发展过程中的我们,在学术的境地不无尴尬:当我们尚未享受到现代性成就带来的诸种益处时,我们不得不陪着西方学者咀嚼现代性的苦果;当我们尚未得到现代性制度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又跟在

^① 参见 Gans, Herbert. "Best-Sellers by Sociologists: An Exploratory Stud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March 1997, Vol. 26, No. 2, pp. 131—135。在该文的一个注脚中,甘斯甚至认为《真正的穷人》是近十年在社会学和一般社会学读者中影响最大的书之一。其实,在《当代社会学》杂志1996年选出的“近25年来影响最大的十本书”中,就有威尔逊的《种族重要性的降低》。

别人后面指责启蒙方案的巨大弊端。当然，我并非否认此类研究的价值，特别是对我们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反思意义，而是试图强调，如果我们在“问题意识”上一味地“顺应世界潮流”，恐怕很容易迷失自我。眼睛盯着别人，很可能就忽视了自己立足的大地。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目前学界的诸多理论热点，除了满足少数学者自己安身立命的需要外，似乎跟一般民众的生存关系不大。若是真能安身立命，也算功德圆满了，但从学者的表现来看，似乎又未必如此。另外，科学应当使人明白，但我们如今的学者舞弄着诸多舶来的概念和理论以努力让我们陷入困惑，而不是让我们更加透彻地审视现实。当然，这其中的根源极为复杂，而且我们也不排除少数学者持有另外一种深层的关怀，即惟有如此，方能锻造出锐利的理论工具，至少为特定学科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脱离现实的学术，确有蜕变为仅仅满足学者自身认知和审美需要的工具的危险。

怎么既坚守学术乃至学科的准则，又真正关切现实的问题，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课题。而威尔逊的这本《真正的穷人》，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城市贫困和公共政策的范式，也为学者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是我们对此书大感兴趣的一个主要理由。

另一方面，此书所处理的主题，对于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我们，颇有可以借鉴之处。虽然我们城市中尚未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但一个相当规模的底层阶级似乎正在形成。作为既无资源又无技能的城市边缘群体，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拼命想先富起来的

各类精英的视野(所谓的精英们,现正热衷于建构自己的高档住宅区,以把他们彻底阻挡在自己心安理得的幸福生活之外),而他们表达自身的能力和机会又极为有限。或许,请允许我天真地想象一下,此书在引起有识之士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上,也能产生一点点的作用?毕竟,“广求民瘼”是我们优秀的传统。当然,我们更希望此书对于如何研究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还有,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美国社会中可资利用的数据资料的详尽和充分,也深有感触。大凡公共政策的讨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如果对于事实没有明确的认定,如何施展我们对于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怀?相关的政策主张又以什么作为基础?没有人文关怀的数据是冷酷的数据,但没有数据的人文关怀可能也会流于廉价的怜悯。我们认为,无论是各级公共机构还是学界,都应注重监测社会动态的各类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这是我们做出科学诊断和决策的根本依据。

或许,翻译一本小册子,并不值得如此大发感慨。但对于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所得到的帮助,却不能不提及:薛毅教授专程到南京跟我商定翻译此书的事宜,并在后期一再容忍我们时间上的拖延;专攻社会工作的韩晓燕博士,为帮助我们准确理解一个短语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竟四处找人广为询问;李林艳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为我们收集了有关作者和本书的资料。对于他们的帮助,深表谢意!

本书翻译的分工如下:张戌凡翻译了第三章和第四章,鲍磊

翻译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附录,其他部分则由我翻译。对于他们的译稿,我逐字逐句进行了校对和修改,以求译文的准确和措辞风格的统一。至于译文中难免出现的错误或不当之处,则应归于我一个人,这不仅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师,也因为我是最后的定稿人。

成伯清

2007年1月

前言

197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那本颇受争议的《种族重要性的降低》。我本来希望,这本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一种宏观历史—理论的框架,解释美国种族问题的变迁。此外,我还希望该书能有另外一项贡献,即,通过与黑人中产阶级日益得到改善的处境相对照,唤起人们对黑人底层阶级——既在绝对的意义,也在相对的意义——日益恶化的状况的关注。

《种族重要性的降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传媒,都引起了争议。该书问世之际,恰逢种族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因为剧变的社会结构动摇了种族关系的许多传统模式,同时,也是因为政府别无选择地卷入到当时针对平权法案的争论之中。

在该书出版后的最初数月,评论者似乎过于关注我不得不谈到的黑人中产阶级状况的改善,而基本上忽视了我更为重要的论点,即黑人底层阶级状况的恶化。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既然所有的黑人都蒙受伤害,那就没有必要单独拣出贫困黑人来说事。

就在人们围绕着《种族重要性的降低》争论不休之际,我让自己全力投入到两件事情之中:一是我要对聚居区底层阶级的问题展开综合的分析;二是要详尽阐述我的研究工作的政策含义。正是这两项承诺,为《真正的穷人》的撰写提供了方向。第一项承诺

源于我个人对早期批评者的学术回应，他们一心只放在我有关黑人中产阶级的观点上。事实上，仅是到了我开始着手撰写《真正的穷人》的时候，严肃的学者（特别是那些从事诸如城市贫困、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之类研究的学者）才开始关注我在《种族重要性的降低》中对底层阶级的分析。

第二项承诺源于我对另一些批评者的回应，他们要么把我标定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要么直接或间接地试图把《种族重要性的降低》与新保守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尽管我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在政治上或许比这些批评者中的绝大多数还要左倾，也尽管对《种族重要性的降低》最正面的评价和讨论不少就是来自民主左翼，但我这本书的标题，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我是一位黑人保守主义者。还有，由于我在第一版中没有明确说出《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的政策含义，人们很可能有选择地解读我的论点，并从中推导出我个人无法认同的政策含义。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针对颇具争议的莫伊尼汉报告未曾提出政策建议所发的一番议论，用在这里也很合适。甘斯说，“一项政策提案由于没有附上具体的建议而留下的空白，很容易就被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所填充，况且报告中的结论部分，也容易遭到误解”^①。在1980年出版的《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第二版中，我撰写了一篇后记，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我的研究工作的政策含义，但到那时，第一

^① 赫伯特·J.甘斯，“黑人家庭：对莫伊尼汉报告的反思”，载于《莫伊尼汉报告与争论政治》，李·雷因沃特和威廉·扬西主编（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449页。

版的许多读者的观点,已经定型了。

如果说《真正的穷人》一书的想法源于有关《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的争论,那么是否意味着前者也会带来争论?看来在所难免。《真正的穷人》在分析内城区问题时,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以率直的措辞讨论了内城区的社会病理;确立了一种主张,即,应当从专门针对种族问题的旨在改善内城区社会条件的政策,转向解决社会性组织(包括经济组织)的一般问题的政策;倡导一种社会民主的公共政策议程,以改善诸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之类真正弱势群体的生活机遇,而且这种议程所注重的方案,应是所有种族中具有优势地位的群体也能积极认可的。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真正的穷人》中的许多核心理论观点,并非是受到有关《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的争论的启发,而是源于我自己过去几年在芝加哥市内城区的街头巷尾的观察体验,也源于我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包括内城区居民点阶级结构的变迁。《真正的穷人》第一部分的文章,详细描述了这些变迁,并探讨了聚居区底层阶级的社会境况何以在近年来急剧恶化的问题。

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我简要讨论了这些社会变迁,考察了目前有关“底层阶级”一词用法上的争论,并尝试着解释有关聚居区底层阶级的自由主义观点为何近年来失去了影响力。在本章的最后,对于自由主义者在目前受到保守主义代言人把持的公共政策论坛上如何重新获得领导地位的问题,我也有所讨论。在第二章中,我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述内城区所存在的暴力犯罪、非婚生育、女性户主家庭和福利依赖的问题,并认为近来这类社会

断裂的激增,不可能通过种族歧视的简单解释来予以说明。事实上,这些问题必须联系到由其他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来说明,所谓的其他因素,包括城市经济体系的变迁——它导致了黑人失业率的异常升高,而这又激化了聚居区中的其他社会问题——以及内城区的阶级变化。第三和第四章,则批判性地检视了从福利国家角度对聚居区底层阶级中的社会断裂剧增所作的通行解释,而且在检视的过程中,专门考察了失业与女性户主家庭比例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引入和提供了有关“适宜于结婚的男性储量指数”的全国数据;第四章给出了这一指数的地区数据,并将之与女性户主家庭的地区数字联系起来分析。该章还考察了地区经济的结构变迁与“适宜于结婚的男性储量指数”及女性户主之间的关系。

《真正的穷人》第二部分的文章,批判性地检视了有关聚居区底层阶级问题的不同公共政策取向。第五章揭示了针对种族的政策(包括平权法案在内)在处理聚居区底层阶级问题上的缺陷,指出优势家庭出身的少数民族成员从这类政策中获益过多,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代表了自己的种族群体中最具有资格获得优越职位的人群。因此,该章主张,真正处在弱势群体地位的少数民族成员,比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他们的条件的改善,需要的是并不专门针对种族的政策。第六章扩展了第五章所呈现的分析,检视了在解释聚居区底层阶级问题和提出公共政策解决方案上,种族关系的视角和“消除贫困之战”计划的视角的局限性。该章认为,这两种视角由于没有把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与经济组织的一般

性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它们不能对1970年以来内城区社会断裂的剧增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来自自由主义的有效解释的缺乏,为保守主义公共政策观点的出现清除了道路,后者认为必须改变少数民族穷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最后,第七章整合和总结了前面各章的基本观点,然后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公共政策议程,以改善诸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之类真正弱势群体的生活机遇。这一议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包含了普遍性的计划,而这种计划可以吸引和维持所有种族和阶级中的优势群体的支持。

在准备写作本书时,我从福特基金会的一项资助中获益良多,这项资助旨在支持针对当代社会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撰写人文主义的非小说类著作。本书也极大地受益于斯宾塞基金会的一项资助。这两项资助,使我可以在1982至1983学术年度中减轻教学负担,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写作之中,并聘请了两位非常优秀的研究助理,即罗伯特·阿朋特(Robert Aponte)和卡瑟琳·内克尔曼(Kathryn Neckerman),他们为本项研究收集和分析了数据。另外,内克尔曼还合作撰写了第三章,即“贫困与家庭结构:证据与公共政策议题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阿朋特和内克尔曼都协助撰写了第四章,即“失业与福利效应:重新考察”。本书的附录“城市贫困:最新文献综述”,是我与阿朋特合写的。我还要感谢另外两位研究助理为我所做的一切:路伊奇·华康德(Loic Wacquant)绘制了芝加哥市贫困和失业在社区区域扩散的地图;帕特里西娅·波特(Patricia Potter,与华康德一道)收集了内城区贫困集中的数据(见第二章)。

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作为研究人员所度过的1981至1982学术年度,也使我受益匪浅。在那里,我为本项研究作了大量的文献阅读上的准备,同时,主要是通过参与中心一系列的使人深受启发的研讨会,我得以与许多国内一流的社会政策专家进行交流,并由此形成了我有关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观点。

最后,我受惠于伯纳德·吉福德(Bernard Giffor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院院长)和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评论。吉福德和卡茨尼尔森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写下详细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它们对本书的修改和定稿非常有帮助。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贝弗莉(Beverly),我敢肯定,她从未意识到她对我的学术发展有多重要。就跟对我以前的著述一样,她编辑了本书的全部原稿,并且还是一位颇富洞见的批评者。但她还做了更为重要的事情——她对我的工作的热心支持,具有一种焕发青春活力的效应,使我克服了写作后期不时出现的疲惫,并使我在诸多地方性和全国性事务缠身的情况下完成了本书。